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

赵　枫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是中华民族对于军事道德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和总结，是研究这种认识规律的科学。

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战争就一直与人类相伴而行。战争需要道德也呼唤着道德。战争与道德密切相关的现象促使人们思考：道德在战争中有什么作用？它从哪来？它要求人们如何对待战争？战争参与者应有什么样的道德？他们如何形成这种道德？这些问题实际上即是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战争道德观问题，军事道德规范问题，军事道德教育和修养问题。其中又包括军事道德与社会一般道德的关系问题，义利关系问题，人性问题，等等。战争实践的每一步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会把人们的认识引向深入广泛，使他们进一步思考更多的军事伦理问题。人们对于这些诸多问题的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逐渐积累起来，从而形成较完整而不是零星和片面的思想和看法。这是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中国军事伦理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

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高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时间大约从原始社会末到西周。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据考古证明，早在一百六七十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活、栖息在这块大地上，经历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因为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带政治含义的阶级战争。当时虽然也会发生氏族间、部落间的争斗，但这仅仅是为了生

存，为了血缘复仇。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社会成员逐渐被划分为不同阶级，这时也就出现了带阶级政治的战争，如传说中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在战争中人们初步认识到了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①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奴隶制的确立，战争更成为统治者手中常用的工具，到西周时就已发生了38起战争。这时，人们的道德认识进一步深化，开始考虑军事道德起源问题，如夏把道德来源说成是“鬼神”，商归结为“上帝”，周归结为“天命”。夏商周的统治者在征伐敌国时都声称自己正义在握，如夏征有扈氏有“甘誓”，讲自己“替天行道”②；商灭夏，战前有“汤誓”，老调重弹；周灭殷商也说自己“替天行罚”③，这表明，当时人们已有义战观念。西周时出现的《军志》、《军政》两部军事著作，虽已散佚，但从《左传》看，《军志》提到了“有德不可敌。”④由于这一时期的军事伦理观念与宗教意识相混淆，人们未能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战争要素来认识，并未能提出系统的军事道德规范，因此，它处于军事伦理思想的萌芽时期。

第二阶段：形成时期。时间为春秋战国之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战争频繁，据史料记载，其间大约发生了614次战争。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机器也越来越完备，如到春秋末期出现了专职将帅。战争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时，社会各阶级、阶层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对战争及军事伦理诸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形成了兵、儒、道、法各家“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阶段，以孙武的《孙子兵法》为标志，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宣告形成。因为在该书中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脱离了宗教的形式，第一次把它作为与战争相关的相对独立要素来认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军事道德要求。

第三阶段：发展阶段。从秦汉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王朝时期，前后历经2000多年。其间发生了约3000次战争。在这一阶段，封

建统治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伦理影响甚大，军事伦理的研究被置入统治者意识形态研究范畴之中。汉王朝曾先后三次派人搜集和整理兵书，宋时更是由官方直接组织人力编撰兵书，并以“诏令”的形式颁定兵书为“武经”。这时的军事伦理思想从总体上说是封建统治者的御用伦理，忠君亦被放置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但各时代的思想家们结合当时军事对军事伦理诸问题展开了探讨，使军事伦理的内容更丰富、具体和深刻。

第四阶段：高峰阶段。时间约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在清政府腐烂不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频频得逞的情况下，对军事伦理应向何处发展的问题，不同阶级作出了不同回答：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力图以原有封建军事伦理规范军事活动，他们把这种伦理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级提出了农民阶级军事伦理，把中国农民起义道德推向了高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资产阶级军事伦理思想，它使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走上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军事伦理发展过程中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军事伦理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军事伦理，如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只能产生奴隶制时代的军事伦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军事伦理，如在近代，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因而有不同的军事伦理。社会向前发展了，军事伦理也随之发展。如在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军事伦理随着社会进入封建时代而让位于封建地主阶级军事伦理。其次，军事伦理思想受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政治是经济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在意识形态诸形式中，政治思想起着核心作用，给其它形式以强烈的影响，表现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就是政治思想直接规定了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主张恢复奴隶主贵族

统治，在军事伦理上也就反对与此不相适应的一切战争，使其军事伦理显示出没落的性质；商鞅主张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在军事伦理上就提出了与此相一致的、反映地主阶级进取精神的耕战伦理。第三，军事伦理思想在其发展中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认识过程总是有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每一时代的思想家总是在借鉴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把军事道德的认识推向深入的。如对于军事道德与社会一般道德关系的认识发展。在孙武写《孙子兵法》时，他并未对军事道德与社会一般道德进行区分；《司马法》弥补了这一不足，提出了“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的要求；到了李筌，认识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认为应区分军事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而且还应区分不同职务军人的道德。从孙武到李筌，就形成了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第四，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与每一时期的战争现实密切相关。就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无非经历着战争与和平的更迭和替换。军事伦理思想是有关战争的伦理，因此社会的战争现实会给军事伦理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战争的现实能迫使统治者重视军事问题，迫使思想家们正视战争现实，从而为战争伦理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及后来的宋朝之所以会形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局面，就是因为当时战争频繁的缘故。此外，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对军事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兵制的完善，战争规模的扩大，也会给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

研究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及其发展规律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上讲，有助于建设好当前我国的军事伦理学。我国的军事伦理学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军事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虽然与以往的军事伦理思想有本质区别，但它既然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就必然和以往的中国伦理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是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决军事伦理史上的问题，如义利问题、道德起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问题，还是用中国伦理史上的材料丰富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学，如用古代的爱卒思想来丰富今天的爱兵思想，抑或从学习军事伦理思想史掌握其规律以便更深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思想的科学性、革命性上看，研究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实践看，研究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有助于当前我军的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真知灼见，他们提出了重视道德的战争作用思想、慎战思想、义战思想、爱兵思想、道德教育和修养思想，等等。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提高人们道德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认识到把我军建设成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必要性，增强军人文明带兵、文明当兵的自觉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它们至今还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影响着当前的部队建设，如愚兵思想。通过学习军事伦理思想史，分析批判这些糟粕，有助于消除这些旧思想的影响，减少军队道德建设的阻力，促使道德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

本书通过叙述分析军事伦理思想史上的有关人物及理论著作来揭示中国军事伦理认识史及发展规律。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下跨度几千年，其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灿若星河。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取舍问题。在人物方面，本书只选取了在军事伦理思想方面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的人物，因为只有著作，他们的军事伦理思想才能被准确、系统而又全面地看清。在叙述和分析这些伦理思想的过程中，我力求做到：一是尊重史料。在中国历史上，古代的许多兵书是残缺不全的，如《吴起》、《孙膑兵法》，分析这些兵书时力求做到分析的系统性。在许多著作中，军事伦理思想是零散的，它们需要被归纳和整理，在归纳和整理中不掺进主观猜测的成分。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军事伦理思想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之上，揭示其阶级本质。如分析前人爱民思想时，一方面既指出各时代、各阶级在这一思想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指出

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对爱民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三是把所分析的人物、著作置于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长河中，着重指出他们在伦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在宏观上收到既进一步把握了所分析人物和著作又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的双重效果。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有关资料，如《中国军事史》⑤、《中国兵书知见录》⑥，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人学识所限，书中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注　释

①《韩非子·五蠹》

②《尚书·甘誓》

③《尚书·多士》

④《左传》僖公28年

⑤《中国军事史》，《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⑥《中国兵书知见录》，许保林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9月版

目　　录

前言……（1）

第一编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2）

第一节　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2）

第二节　吴起的军事伦理思想……（9）

第三节　《六韬》的军事伦理思想……（16）

第四节　孙膑的军事伦理思想……（24）

第五节　《司马法》的军事伦理思想……（32）

第六节　尉缭的军事伦理思想……（39）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军事伦理思想……（49）

第一节　老子的军事伦理思想……（49）

第二节　孔子的军事伦理思想……（55）

第三节　墨子的军事伦理思想……（63）

第四节　《管子》的军事伦理思想……（68）

第五节　商鞅的军事伦理思想……（75）

第六节　荀子的军事伦理思想……（83）

第七节　韩非的军事伦理思想……（87）

第八节　《吕氏春秋》的军事伦理思想……（91）

第二编　秦汉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

第三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99）

第一节　《三略》的军事伦理思想……（99）
第二节　《淮南子》的军事伦理思想……（107）
第三节　曹操的军事伦理思想……（114）
第四节　诸葛亮的军事伦理思想……（120）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128）
第一节　《唐李问对》的军事伦理思想……（128）
第二节　李筌的军事伦理思想……（133）
第五章　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的军事伦理思想……（139）
第一节　《历代兵制》的军事伦理思想……（139）
第二节　《武经总要》的军事伦理思想……（144）
第三节　施子美的军事伦理思想……（152）
第四节　《何博士备论》的军事伦理思想……（161）
第五节　《十七史百将传》的军事伦理思想……（166）
第六节　戚继光的军事伦理思想……（172）
第七节　其他军事著作中的军事伦理思想……（181）

第三编　清（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

第六章　曾国藩、左宗棠的军事伦理思想……（197）
第一节　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197）
第二节　左宗棠的军事伦理思想……（209）
第七章　洪秀全的军事伦理思想……（218）
第八章　近代资产阶级军事伦理思想……（229）
第一节　孙中山的军事伦理思想……（229）
第二节　黄兴的军事伦理思想……（238）
第三节　蔡锷的军事伦理思想……（245）

第一编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先秦兵家对军事伦理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写出了《孙子兵法》、《吴起》、《六韬》等一大批兵书。其中，《孙子兵法》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也对军事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

兵家是指在军事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和成就，对军事科学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或影响的军事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兵家主要有《孙子兵法》、《吴起》、《孙膑兵法》等兵书的作者孙武、吴起、尉缭等人。

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军事伦理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的主体。因为：第一，兵家对军事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他们研究政治、经济的出发点和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因此他们能比儒家、道家等更全面、系统地阐述军事伦理问题；第二，兵家或者从事过战争指挥活动，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或者对战争进行过长期的专门研究，因而他们的思想更贴近战争现实，提出的军事道德规范等内容更具体、更具有军事特点，影响更深远；第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以《孙子兵法》的产生为标志。因此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就应首先研究这一时期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

第一节　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原为齐国田氏的后裔，后到吴国，助吴王阖闾改革图强。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①。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还发现《吴问》等佚文。其军事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重战的战争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和看法，其中包括了将领对战争所持的基本道德态度。在春秋时期战争频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战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孙武对此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这里反映出他对战争问题的两点基本态度：一是对战争应持积极的态度，所谓“兵者……不可不察”即是说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应回避战争现实，对战争掉以轻心，而是应主动地、认真地去看待战争问题；二是君主、将领应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要知道战争是“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而不要热衷于战争、轻率地发动战争。

孙子慎战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减少战乱的危害，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即他未能进而指出战争有合乎道义与否之分，未能提出义战思想。虽然他也谈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③但始终未能就“善用兵者”用兵的性质，用兵者双方合乎道义与否的区分作过明确的阐述。甚至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有时完全撇开了道义上的考虑，如他说用兵者为了争夺制胜条件就可以“掠乡分众，廓地分利”④，打侵略战争。

二、利与义

孙武认为，道德在战争中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本身是由利益决定的。战争的目的及指挥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是利。因此他的军事伦理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孙武指出，军事道德在战争中作用是很大的。他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把战争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来研究，指出“胜可为”⑤。他认为考虑战争胜负可从“五事”、“七计”方面进行。所谓“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⑥把握了这些，即可为胜败之政。在这“五事七计”中包含了许多道德内容，如“五事”中的“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也”，“将”是指将的

“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由此可见，他是把道德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因素来考虑的。

孙武认为，道德在战争中的这种作用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战争的目的及指挥战争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即是为了争利。这表现为：在战争的发动上，他要求君主、将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⑦；在具体指导战争时，“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⑧。战争的道德及其作用只有与此相联系才有意义。他的重战、慎战思想就是建立在利益考虑基础上的。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若远道征战，则损耗更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⑨远途运输费力耗财误农时，国家和百姓世族会由此而贫困。正是基于这种利害考虑他才提出慎战思想。他的关于将德的思想也是与利益密切相关。如他说，将帅用间要不吝啬爵禄和金钱，否则，看不到战争对国对民的巨大损耗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⑩

孙武上述重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军事伦理的利益基础和内容，也反映了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急功近利的特点。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未能进一步指出这个利的正确含义，未能指出正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的道德。同时，由于他把“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等内容包容进了利的范围，所以其道德观也就带有强权霸道者的实用主义色彩。

三、仁与诈

孙武重仁，更重智。在指出将所应具德时，他把智排在仁之前，使之居于首位：“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的具体表现和形式是智者能在战争中“知彼知己”，其实质内容是“计利”(11)，因此，“智”和利关系密切。智者为了实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就要使用一定的手段。孙武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即是使用诈术：“兵以诈立。”(12)诈即欺诈。诈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敌：“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3)其中既有战略上使敌产生错觉而就范的内容，也有在道德上诱敌失德而乘之的内容，前者如“能而示之不能”，后者如“乱而取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等。再一是对己方士卒的。在驾驭士卒时孙武认为也要使用诈术，如他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14)有人认为，孙武“兵以诈立”只是对敌而言的，从上述所引看，在统帅士卒方面他讲诈术是确定无疑的。

孙武以诈术、诡道为用兵的基本手段，这从战争不能拘守于和平时期一般社会道德角度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并未由此进一步全面地看待战争手段问题，因而未能看到道德感召作用的巨大威力——战争一方凭借着自身雄厚的道德力量，通过感召对方有时能收到战争所收不到的效果，虽然他也说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要“以全争于天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5)，但并未就这些思想作进一步的阐发。也正因此，孙武“兵以诈立”的思想招致了历史上不少人的批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即责备孙武谈的兵不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志”(16)，宋时叶适说：“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17)高似孙也说：“兵流于青，始于孙武乎。武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18)郑友贤更把孙武与司马穰苴作比较，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19)上述批评，从荀子他们看到孙武讲道德不足这点上看，都是有其合理性的。

四、将帅道德规范

孙武十分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20)。他的军人道德规范就是针对他们提出的。

1．忠君。孙武认为“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21)固此

将应忠君。忠君的具体表现即是要时时惦着君主的利益。“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即不可以从个人私忿出发，而应考虑到“安国全军”(22)再决定战与不战。将带兵在外，“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23)这里须注意的是，孙武所说的忠君并未有后来的绝对服从君主的含义，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将帅是具有较大选择权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4)这反映了春秋末期各国激烈争夺人才及后者在服务对象上有较大选择权的现实。

2．爱抚士卒。士卒是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战争过程的实际进行者。将帅要赢得战争就要处理好与士卒关系。为此，孙武提出了爱卒要求：“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25)。以为这样才能使士卒与将帅共“赴深溪”，“俱死”。在爱卒问题上孙武强调了两点：一是爱须有度。视卒“如婴儿”、“如爱子”，是言爱卒要深。但这个深是有度的，爱过了头，则“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26)如何使爱恰到好处呢？孙武认为这就要强调对下属的纪律约束。二是要愚卒。孙武爱卒是要让士卒感受到将帅的恩典而为将帅卖命。这里不需要将帅的感情付出，需要的只是他们严密的功利盘算和士卒对将帅感情上的感激和依赖，所以将帅在爱卒的同时，为了战争需要，同样应运用好愚卒手段，做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指挥他们“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27)。孙武的爱兵思想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观点一直被历代兵家奉为圭臬，指导着他们正确处理将卒关系。在今天，这一思想对军队建设仍起积极的借鉴作用。当然，其爱卒思想中所包含的轻视士卒、愚卒的成分出于剥削阶级利益、要求及偏见，在今天是要抛弃的。

3．信赏罚。孙武认为，对士卒不能仅爱，要“合之以文，齐之以武”(28)。这里的武即说的是军纪、军法。他认为，将帅执行军纪、军法

要严明，他把“法令孰行？”“士卒孰练？”作为判断战争胜否的“七计”的内容。赏罚严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即为信赏罚。孙子本人在实践中即是信赏罚的典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武见吴王阖闾，吴王让他用宫女试兵法，宫女列两队，以吴王两宠姬为队长。宫女列队后，嬉笑不已，孙武三令五申不见效，斩吴王两爱姬，这时的宫女也就“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由此事可见孙武信赏罚之一斑。在赏罚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要信，另一方面又提出：第一，赏罚的实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29)第二，在赏罚方面有时也应“愚兵”，“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30)，使士卒不知所以而增加将帅的神秘感和权威。

4．善待战俘。在《作战篇》中，孙武提出对被俘士卒要“善而养之”，即善待和使用他们。他提出这一要求的动机是要减少战争对人财物力的损耗，达到“胜敌而益强”(31)的目的。这一思想表明，孙武实际上已把战争的发动者、指挥者及得益者与战争的被动实施者士卒区分了开来，初步认识到了战争实际上是统治者争利的活动。因而在具体对待敌方士卒上表现了道德上的极大宽容。同时，他的善俘思想在当时杀俘成风的条件下，对于保护生产力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军人道德教育

孙子重视将帅在治军中的作用，并提出将应具智信仁勇严五德。但就将帅如何形成这五德的问题，孙武未进行说明。这也许是与孙武以士的身份见吴王有关，因为作为身份特殊的士卒在见吴王求为将之前，他的是否适于任将的品质是早已形成了的，因此在进见吴王的十三篇中也就没必要论述君主如何教育将帅问题。

但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士卒的道德教育却是比较重视的。他认为应对士卒进行道德教育，否则“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即是“乱”，乱军必败(32)。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这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争工具简陋，士卒的勇敢

精神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关。士卒勇敢精神的集中表现，就是能做到为将帅尽死力。孙武认为，培养士卒勇敢精神主要应从这么几方面努力：一是用激怒士卒的方式使他们勇于杀敌：“杀敌者，怒也”(33)。虽然用什么来激怒士卒，他未说明，但“杀敌者，怒也”说明孙武认为可通过调动士卒情绪使他们勇敢。二是用爱卒手段。爱卒能使士卒对将帅抱感恩态度而不怕敌方，不怕死。三是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孙武认为，若把士卒置之死地，就能激起他们强烈的求生欲望而忘掉恐惧。他说，若军队进入了死地，“是故不修而戒，不求不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34)四是用赏罚手段。用赏罚手段使士卒勇于作战。如他讲“取敌之利者，货也”(35)，即要夺取敌方资财就要舍得奖赏士卒。五是上下同欲。“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36)这就要求君主增加自身修养等等。孙武认为，对士卒的教育应平时、战时始终如一：“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37)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从上述分析看，它使军事伦理思想与宗教思想区分了开来，包含了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内容。它的产生为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开拓了领域，提供了课题。因此，《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伦理思想产生的标志。

注 释

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⑥⑾⑿(24)(36)《孙子兵法·计篇》（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③《形篇》

④⑿(21)《军争篇》

⑤《虚实篇》

⑦(22)《火攻篇》

⑧《九变篇》

⑨⑳(31)(33)(35)《作战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